

陶希聖與《中國之命運》中的 「中華民族」論述

• 婁貴品

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一書，曾在國內外造成很大影響^①。該書第一章「中華民族的成長與發達」關於中華民族的起源及國內各族間關係的觀點，被當時的貴州省主席楊森概括為「國族同源」^②，在中國近代民族主義史上產生了重大影響。當時蒙藏研究專家黃奮生肯定該書「揭出了新民族政策的歷史背景和莫立了新民族政策的堅固基礎」^③，依據的便是這一章。

根據史學界長期流行的「陶希聖代筆《中國之命運》」的說法，這一章的著作權無疑應歸陶希聖。但是，近來「陶希聖代筆」說已遭到有力的質疑。李楊的研究指出：「陶希聖對該書的起草和校定、整理起了重要作用，是部分書稿的起草者；在書的立意和觀點上，蔣介石提供了思想基礎；在內容上，蔣介石的增訂、補充部分，遠遠超過初稿篇幅；在時間上，蔣介石花費的時間並不比陶少，說陶希聖代書《中國之命運》的觀點至少是簡單化，甚至是不準確的。」^④儘管學術界對《中國之命運》的研究已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水平^⑤，但對該書關於中華民族的起源及國內各族間關係的論述與「代筆」者陶希聖之間的關係，仍尚未給出較有說服力的答案。鑒於這一問題在中國近代史研究、民國史研究、中國近代民族史研究、蔣介石研究、陶希聖研究中的重要性，筆者擬對該書初版和增訂版第一章與陶希聖的關係作一番細緻的考察，希望能對該問題的解決有所助益。

儘管學術界對《中國之命運》的研究已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水平，但對該書關於中華民族的起源及國內各族間關係的論述與「代筆」者陶希聖之間的關係，仍尚未給出較有說服力的答案。

一 《中國之命運》初版中關於中華民族的 論述確實與陶希聖有關

1943年3月10日，《中國之命運》初版^⑥出版，蔣介石寫道：「就民族成長的歷史來說：我們中華民族是多數宗族融和而成的。」「四海之內，各地的宗族，若非同源於一個始祖，即是相結以累世的婚姻。詩經上說：『文王孫子，本支百

《中國之命運》初版中關於中華民族的論述，與蔣介石於1942年8月在西寧的演講是完全一致的。蔣在這次演講中對中華民族的認識與陶希聖有關。陶被蔣任命為委員長侍從室第五組組長，襄助陳布雷撰述文稿，可以判定，演講稿是陶所起草。

世，』就是說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詩經上又說：『豈伊異人，昆弟甥舅，』就是說各宗族之間，血統相維之外，還有婚姻的繫屬。」^⑦楊躍進認為，這個解釋與陶希聖在《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中所作的論述有相同之處。陶著中的相關論述是，「血統是形成民族的一大自然力；民族是歷史上融合的結果。民族是依一定的融合，由言語、地域生活、經濟生活及文化的共同性而統一的歷史上構成的永續的共同體。」^⑧楊躍進因此得出結論：陶的觀點溶入了蔣的思想體系中^⑨。

然而，只需簡單對比，即可發現，這兩段話之間的相似程度實在不怎麼高，如以此為據，楊氏的結論自然難以令人信服。可是，其結論又是毋庸置疑的。問題出在哪裏呢？出在其所舉證據不當。其實，最直接的證據仍在《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一書中，該書有這樣一段話：「本來，周室建國，是以武力克復中國舊來的民族之後，分封異姓功臣和同宗子弟，一方面在同宗宗族內，厲行『本支百世』的組織；一方面於異姓各族間，交互通婚，以組織成親戚之網……」^⑩陶所謂「在同宗宗族內，厲行『本支百世』的組織」，與蔣的「詩經上說：『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就是說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相對應，這一層意思可以概括為「同源論」；而陶所謂「異姓各族間，交互通婚，以組織成親戚之網」，則與蔣的「詩經上又說：『豈伊異人，昆弟甥舅，』就是說各宗族之間，血統相維之外，還有婚姻的繫屬」相合，這一層意思可以概括為「融合論」。這樣，蔣所謂「四海之內，各地的宗族，若非同源於一個始祖，即是相結以累世的婚姻」，恰好包含了上引《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中那段話的兩方面意思。

不過，這還不是蔣介石在對中華民族的認識方面吸收陶希聖觀點的最早證據。至遲在1942年8月27日，蔣在青海西寧對漢、滿、蒙、回、藏各士紳、活佛、阿訇、王公、百千戶的演講中就接受了陶的觀點。他在演講中說^⑪：

我們中華民國，是由整個中華民族所建立的，而我們中華民族乃是聯合我們漢、滿、蒙、回、藏五個宗族組成一個整體的總名詞。我說我們是五個宗族而不說五個民族，就是說我們都是構成中華民族的分子，像兄弟合成家庭一樣。詩經上說「本支百世。」又說：「豈伊異人，昆弟甥舅。」最足以



陶希聖

說明我們中華民族各單位融合一體的性質和關係。我們集許多家族，而成為宗族，更由宗族合成為整個中華民族……

這一段話明顯包含了「若非同源於一個始祖，即是相結以累世的婚姻」這兩個方面的意思。可以說，《中國之命運》初版中關於中華民族的論述，與蔣1942年8月27日在西寧的演講是完全一致的。

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蔣在這次演講中對中華民族的認識與陶有關。

陶並未隨蔣考察西北，蔣與其商量撰寫《中國之命運》又是在1942年10月10日^⑫，如何確定蔣的演講與陶有關呢？據陶自述，他自1942年2月返回重慶後，便被蔣任命為委員長侍從室第五組組長，「職務是襄助侍從室主任陳布雷先生撰述文稿」^⑬。可以判定，蔣在西寧的演講稿是陶所起草。

必須指出的是，陶希聖《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中的相關論述與《中國之命運》中關於中華民族的論述也有不一致甚至矛盾的地方，為何只有這一段寫進《中國之命運》呢？如《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明確說明：「中國的民族不是單一的民族，所以中國的文化也不是單一的文化。」^⑭而且，這一認識是經過深思熟慮形成的。因為在該書中，陶還提出：「中國境內的人民是不是構成了一個民族？……這些重要問題在目前非解答不可，並且問題的解答還影響到革命的基本問題和政策。」^⑮將「中國民族是不是單一的民族」作為影響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來考量，可見此問題在陶心目中的重要性，其結論自然不是隨意得出來的。此外，在1929年10月發表的〈中國之民族及民族問題〉一文中，陶又提出了這一問題，並得出「中國的民族還沒有健全成立」^⑯的結論。這一結論和「中國的民族不是單一的民族」是一致的。

然而，鮮為人知的是，抗戰爆發後，陶希聖的認識有了轉變，此時他認為中華民族是單一的民族。他在1938年出版的《中國民族戰史》中說^⑰：

現在中國的民族，除了所謂南方的苗獠獯蠻深入叢山外，所剩的漢滿蒙回藏五大民族，經過秦漢到現在二千多年的交流融化，彼此間種族的界限已日就消失，形成團結一體中華民族。在整個中華民族內漢族人數佔百分之九七以上，滿族僅在東北長白山僻地裏尚可找到，為數甚少。蒙古族分布在蒙古及熱察綏的北部，文化上大致與漢族合流。回族住在新疆及甘陝二地的較多，除宗教外，幾與漢族無異。藏族即歷史上的氐羌吐蕃，住在西藏及青海西康一帶，中華民族的組成份雖然複雜，經過悠久的歷史糅合，已變分立的五族為統一的中華民族……

這一新認識與《中國之命運》的相關論述並不矛盾。至此，可以得出結論，蔣介石《中國之命運》初版中關於中華民族的起源及國內各族間關係的論述，確實與陶希聖有關，但並不完全來源於《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還包括《中國民族戰史》。之所以強調初版，是因為《中國之命運》增訂版中的相關論述已有改動，其淵源另有所自，楊躍進對此卻並無提及。

《中國之命運》初版中關於中華民族的起源及國內各族間關係的論述，確實與陶希聖有關，但並不完全來源於《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還包括《中國民族戰史》。之所以強調初版，是因為增訂版中的相關論述已有改動，其淵源另有所自。

二 《中國之命運》增訂版中關於國族同源論的論述與陶希聖無關

1944年1月1日，《中國之命運》增訂版出版，扉頁上有陳布雷寫於1943年12月15日的一段說明，談到蔣介石對全書重加校訂，第一章為重要增訂點之一：「本

表1 《中國之命運》初版與增訂版第一章中關於中華民族的起源
及各族間關係的論述

初版	增訂版
<p>就民族成長的歷史來說：我們中華民族是多數宗族融和而成的。融和於中華民族的宗族，歷代都有增加，但融和的動力是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和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在三千年前，我們黃河、長江、黑龍江、珠江諸流域，有多數宗族分布於其間。自五帝以後，文字記載較多，宗族的組織，更班班可考。四海之內，各地的宗族，若非同源於一個始祖，即是相結以累世的婚姻。詩經上說：「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就是說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詩經上又說：「豈伊異人，昆弟甥舅，」就是說各宗族之間，血統相維之外，還有婚姻的繫屬。古代中國的民族就是這樣構成的。</p>	<p>就民族成長的歷史來說：我們中華民族是多數宗族融和而成的。這多數的宗族，本是一個種族和一個體系的分支，散布於帕米爾高原以東，黃河、淮河、長江、黑龍江、珠江諸流域之間。他們各依其地理環境的差異，而有不同的文化。由於文化的不同，而啟族姓的分別。然而五千年來，他們彼此之間，隨接觸機會之多，與遷徙往復之繁，乃不斷相與融和而成為一個民族。但其融和的動力是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和的方法是扶持而不是征服。自五帝以後，文字記載較多，宗族的組織，更斑斑可考。四海之內，各地的宗族，若非同源於一個始祖，即是相結以累世的婚姻。詩經上說：「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就是說同一血統之內而有大小宗支之分。詩經上又說：「豈伊異人，昆弟甥舅，」就是說各宗族之間，血統相維之外，還有婚姻親戚的繫屬。古代中國的民族就是這樣構成的。</p>

與《中國之命運》初版相比，增訂版關於中華民族的起源及國內各族間關係的論述已有較大的變化，其中最重要的是明確闡述了中華民族同源論的主張。這一主張與陶希聖的觀點差異明顯，而與徐永昌的修改意見有關。

資料來源：蔣中正：《中國之命運》，普及本（重慶：正中書局，1943），頁2；《中國之命運》，增訂版（重慶：正中書局，1944），頁2。

書自今年三月十日開始發行以後，印刷至二百餘版。茲經總裁就全書加以校訂，交正中書局重製增訂版。其重要增訂之點：（一）為第一章對於中華民族成長之歷史說明，有所增益。（二）……」^⑧具體的變動詳見表1。

與《中國之命運》初版相比，增訂版關於中華民族的起源及國內各族間關係的論述已有較大的變化^⑨，其中最重要的是明確闡述了中華民族同源論的主張。這一主張與陶希聖的觀點差異明顯。為甚麼會有這一改動？據銓敘部次長王子壯1943年4月5日的日記，「總裁命令次長以上一律限十日內作讀『中國之命運』一書之報告。」^⑩據時任軍令部部長徐永昌1943年4月8日的日記，「下午在軍委會集會，研討中國之命運一書（蔣先生意）。」「余對於第一章（中華民族的成長與發達）以為對中國歷史尚有未盡了然，而忽略漢滿蒙回藏大皆炎黃子孫。」「蔣先生忽略了漢以前無所謂漢族，亦忽略了華夷本屬一家的事實，及華夷所以分的原委。」^⑪徐氏4月22日的日記又記道：「委員長於軍委會所研討中國運命一書之結論，除對余所擬中華民族長成等意見交王秘書長參考修正外，其餘悉不採納。」^⑫《中國之命運》增訂版明確闡述中華民族同源論，與徐氏之關係是否真如

其所言呢？答案是肯定的。這需要從自古代至抗戰時期中國長期流行的民族同源論說起。

民族同源論在中國起源甚早，而且影響較大。如谷苞所言：「在中國傳統時期的歷史人物中，炎黃二帝對後世的影響最大」；「夏、商、周三代是由三個不同的民族建的國家，夏朝和周朝都認為自己是炎黃子孫」；漢族和中國的許多少數民族都認為是炎黃子孫^②。其實，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有不少儒家學者都是堅持民族同源論的。1920年代，顧頡剛提出要「打破民族出於一元的觀念」^③，便是針對這種主張。

這種觀念在中國古代史上長期存在，且不斷發展，成為近代先進的中國人為近代民族國家建構及中華民族建構而尋求的認同象徵和團結象徵。例如1897年，知恥學會於北京創立。學會創始人壽富（滿族人）著〈知恥學會後敘〉中有言：「我中國，神明之裔也，堯舜之遺也。」^④1911年，貴州南龍橋土司、革命志士安健在〈勸滇蜀桂黔諸土司文〉中認為：「所謂土者稟姓受氏，孰非黃帝堯舜之子孫。」^⑤1912年3月19日，黃興、劉揆一、馬鄰翼等發起組織中華民族大同會，呈文孫中山，提到「五族本同一源，尤宜如何痛癢相關，攜手而偕之大道，何可稍存歧視之心」^⑥，呈文得到孫中山批准^⑦。同年5月，經袁世凱授意，姚錫光等發起組織五族國民合進會，其「會啟」稱：「夫我五族國民原同宗共祖之人，同一血統，所謂父子兄弟之親也。……綜觀民族、地理、宗教三者，則我漢、滿、蒙、回、藏五族國民，固同一血統、同一枝派，同是父子兄弟之儔，無可疑者。」^⑧1913年，吳貫因在〈五族同化論〉中依次論述了滿、回、藏、蒙與漢族的關係，認為五族同出一源：「五族之先民其同出一系，既有蛛絲馬迹之可尋，今雖風俗習慣各異其趣，然溯厥由來，既同其淵源。」^⑨

之後，這種主張還出現在教科書中。1914年，中華書局出版的《(新制)本國史教本》認為：「漢滿蒙回藏五族，同為黃種，其先同出於一原，皆由西而移於東。年遠地隔遂相睽異。」1922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新著)本國史》中指出：「世界上的人種，本來是同出一源，不過分支派別之後，各地方的氣候不同，那容貌和膚色，也就有些不同了。現在全國的人民，因為移植地點不同，有漢滿蒙回藏苗六大族的區別。但是讀歷史的人，須知雖有六族的名稱，卻如同一家的兄弟。」^⑩

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組織編輯了《綏蒙輯要》，在題為〈中華民族〉的開篇說明中，也清楚地寫道：「中華民族，都是黃帝子孫。因為受封的地點不同，分散各地，年代悠久，又為氣候懸殊，交通阻隔，而有風俗習慣之不同，語言口音之歧異，雖有漢滿蒙回藏等之名稱，如同張王李趙之區別……」^⑪到抗戰時期，這種主張更是贊成者眾。據張旭光總結，當時關於中華民族的主張有兩派。其中「一派主張，中華民族內之若干支，自古實同一祖先；經過五千年之流轉遷徙，種種演變，固曾分為若干不同之名稱，迄今尚有一部分各異之痕迹，但追溯有史以來之血統，仍為一元的」^⑫。

尤其值得詳述的是，在抗戰時期，無論是在政界還是在學界，持民族同源論的主張者皆大有人在。例如1939年4月，在國民參政會第三次會議上，參政員

民族同源論在中國起源甚早，而且影響較大，成為近代先進的中國人為近代民族國家建構及中華民族建構而尋求的認同象徵和團結象徵。抗戰時期，無論在政界還是學界，持民族同源論的主張者皆大有人在。但《中國之命運》初版中並未予以採納。

居勵今等提〈開發西北與西南先應團結蒙藏回苗夷各族案〉，認為「團結蒙藏回苗工作」的首要任務為「宣傳」，內容是：「由歷史中找出滿蒙藏回苗血統相同之根據，向其民眾宣傳，使我蒙藏回苗同胞，明瞭彼等確為中華民族之一份子，不為外人欺騙與利誘，而自行分化。」^④在參政員喜饒嘉錯於同年6月12日擬呈的〈前赴青海視察寺院宣傳抗戰工作計劃概要〉中，「宣傳要點」的內容之一為「說明我國以往光榮偉大之歷史及歷代各民族間之關係，以種種事實證明國內各民族係同源分支，與國外民族絕不相同，申述本黨各族平等之真義，以增強其民族意識而固團結」^⑤。在約於1941年完成的〈教育部西南邊疆教育考察團關於改進西南各省邊疆教育總建議書〉中，「調整邊教行政機構」中「編輯工作」的具體工作之一是：「關於特定問題之研究事項，如同源論及民族成因新說等……」^⑥「心理建設」部分所提建議中有「提倡同源說，並努力搜集證據」；在具體闡述時又提出：「按同源論之提倡，不僅為國策，並亦為事實宜然，前賢屢有論列，編者亦略有新證，……其進一步之具體辦法，當指定有興趣有能力之專門學者，就此題範圍內加以研究與發揮……」^⑦

由本文所述可知，《中國之命運》初版中關於中華民族的起源及各族間關係部分，不僅是陶希聖所起草，而且在增訂版中也基本得到保留。儘管陶「代筆」的說法遭到質疑，但其對該書的影響還是存在的。

1941年7月18日，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的親信周昆田被任命為《邊政公論》主編及出版主任。8月10日，《邊政公論》創刊號出版。在〈發刊詞〉中，關於中華民族的起源及國內各民族之間的關係是這樣表述的：「在我邊疆廣大的區域上，散居着漢滿蒙回藏各族的人民，而這各個民族，都為大中華民族之一支系，在初本出一源……」^⑧同期刊出周昆田的〈三民主義之邊政建設〉一文，在論及中華民族的起源及國內各民族間之關係時也說：「就我國民族發展之歷史以言，現今所謂漢滿蒙回藏諸族云者，在初本出一源，只以所居區域之不同，遂各形成其特殊之語文與風尚。」^⑨

由上觀之，儘管民族同源論主張在中國起源甚早，在民初還被寫入教科書中，抗戰時期更是廣泛流傳，無論是政界還是學界，贊成者都為數不少，但是，《中國之命運》初版中並未予以採納。1943年9月14日，行政院向各省轉發了蔣介石關於民族及邊疆問題的代電。蔣在密電中希望國人「了解與注意」：「我國人民有宗族之分支，無種族之區別……古之所謂四夷四裔，固無一而非炎黃子孫，近世所謂滿蒙回藏，亦復如此，要皆中華民族也。」^⑩這一認識與《中國之命運》初版中的相關論述已經有了非常大的不同，而《中國之命運》增訂版中的相關論述與此則是一脈相承的。可見，徐永昌所言屬實。至於徐的修改意見與當時廣為流傳的民族同源論有何關係，不得而知。但是，中華民族同源論在抗戰時期的廣泛流傳，當為這一改動營造了有利的歷史環境。

基於以上認識，前述楊森將《中國之命運》初版中的相關論述概括為「國族同源」，是不盡準確的。島田美和依據《中國之命運》初版，即認為蔣介石的民族論「受到了〔抗戰時期〕同源說和融合論的影響」^⑪，也是與歷史事實有出入的。「同源論」與「融合論」固然是抗戰時期關於中華民族的最重要的兩派主張，《中國之命運》初版中的相關表述也確實包含了「同源論」與「融合論」這兩方面的意思，但是它們來源於陶希聖的早期著述，而不是抗戰時期的相關論述。

前引李楊的研究指出，「陶希聖對該書的起草和校定、整理起了重要作用，是部分書稿的起草者」。由本文所述可知，《中國之命運》初版中關於中華民族的

起源及各族間關係部分，不僅是陶所起草，而且在增訂版中也基本得到保留。就這一部分而言，陶確實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儘管陶「代筆」《中國之命運》的說法遭到質疑，但其對該書的影響還是存在的。

註釋

- ① 張憲文、方慶秋主編：《蔣介石全傳》，下冊（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頁532。
- ② 〈自序〉，載楊森編著：《貴州邊胞風習寫真》（貴陽：貴州省政府邊胞文化研究會，1947），頁2。
- ③ 黃奮生：《〈中國之命運〉與新民族政策》，《新中華》，復刊第2卷第2期，1944年2月，頁42。
- ④ 李楊：〈陶希聖與《中國之命運》新解〉，《中國社會導刊》，2008年第13期，頁46。
- ⑤ 參見劉會軍：〈《中國之命運》論析〉，《史學集刊》（長春），1994年第3期，頁36-40、8；鄧野：〈蔣介石關於「中國之命運」的命題與國共的兩個口號〉，《歷史研究》，2008年第4期，頁84-98；李楊：〈陶希聖與《中國之命運》新解〉，頁44-46；〈蔣介石與《中國之命運》〉，《開放時代》，2008年第6期，頁39-51；〈陶希聖與《中國之命運》的歷史與解讀〉，載湯應武主編：《黃埔軍校研究》，第四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9），頁211-86。
- ⑥ 據陶希聖所述，1942年12月下旬，「全書的稿子已定，交南岸海棠溪附近之南方印書館印刷樣本貳百冊」，「分送黨中及政府領導及負責人士閱讀，並請其簽注意見。」1943年1月，「百餘份意見書集中整理。」2月間，「全稿重加通盤修訂，才交正中書局印刷普及本，正式發行。」（參見陶希聖：〈關於《中國之命運》〉，載《潮流與點滴》（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8），頁200。）可見，1942年底印刷的《中國之命運》只能算徵求意見稿，1943年3月10日正式出版的《中國之命運》普及本才是初版。
- ⑦ 蔣中正：《中國之命運》，普及本（重慶：正中書局，1943），頁2。
- ⑧ 引自楊躍進：《蔣介石幕僚的思想研究》（北京：華文出版社，2002），頁120。《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於1929年1月30日由新生命書局出版初版，1930年再版。楊躍進引用的是1930年版，本文引用的則是初版。但就本文引述部分而言，兩個版本並無多少差異，引用初版對本文結論並無影響。初版原文為：「血統是形成民族的一大自然力，……民族是歷史上融合的結果，……民族是依一定的融合過程，由言語、地域生活、經濟生活、及文化的共同性而統一的歷史上構成的永續的共同體。」參見陶希聖：《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上海：新生命書局，1929），頁146、147、148。
- ⑨ 楊躍進：《蔣介石幕僚的思想研究》，頁120。
- ⑩⑪⑫ 陶希聖：《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頁53；51；145。
- ⑬ 蔣介石：〈中華民族整個共同的責任〉，《福建訓練月刊》，第2卷第4期，1943年10月，頁1。
- ⑭ 參見李楊：〈蔣介石與《中國之命運》〉，頁41。
- ⑮ 陶希聖：〈關於《中國之命運》〉，頁201。
- ⑯ 陶希聖：〈中國之民族及民族問題〉，《東方雜誌》，第26卷第20號，1929年10月26日，頁10。
- ⑰ 陶希聖：《中國民族戰史》（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1938），頁20-21。
- ⑱ 陳布雷的說明，參見蔣中正：《中國之命運》，增訂版（重慶：正中書局，1944），扉頁。
- ⑲ 《中國之命運》增訂版出版後，謝偉思（John S. Service）譯出了一個摘要，並附有內容簡介，其中提到「新版中改動的不多，也不重要，某些明顯的事實錯誤改正了，顯然只作了很小的努力來回答共產黨人提出的有根有據的批評。在談到漢族擴

大對其他民族的控制時，原來用的『同化』一詞，在新版中改成了『聯合』（參見埃謝里克[Joseph W. Esherick]編著，羅清、趙仲強譯：《在中國失掉的機會：美國前駐華外交官約翰·S·謝偉思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報告》[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9]，頁88)。此說不確，根據表1，初版中的「同化」是被改成了「扶持」，而不是「聯合」。

- ⑳ 王子壯：《王子壯日記(手稿本)》，第八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1943年4月5日，頁137。
- ㉑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七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1943年4月8日，頁57。
- ㉒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七冊，1943年4月22日，頁67。王秘書長當指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王寵惠。參見鄧野：〈蔣介石關於「中國之命運」的命題與國共的兩個口號〉，頁93，註3。
- ㉓ 谷苞：〈關於如何正確理解炎黃子孫的探索〉，《西北民族研究》，1995年第2期，頁1、3、5。
- ㉔ 顧頡剛：《古史辨自序》，上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頁14。
- ㉕ 引自王爾敏：《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頁186。
- ㉖ 安健：〈勸滇蜀桂黔諸土司文〉，《民立報》，第十冊(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9)，1911年9月5號，頁2127。
- ㉗ 黃興等：〈呈請孫大總統立案文〉，載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三輯，〈政治〉(二)(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頁762。
- ㉘ 孫中山：〈批黃興等呈〉，載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編：《孫中山全集》，第二卷(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331。
- ㉙ 〈五族國民合進會啟〉(1912)，載黃彥、李伯新選編：《孫中山藏檔選編(辛亥革命前後)》(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398-400。
- ㉚ 吳貫因：〈五族同化論〉，《庸言》，第1卷第9號，1913年4月1日，頁3。
- ㉛ 引自劉超：〈現代中華民族觀念的形成——以清末民國時期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為中心〉，《安徽史學》，2007年第5期，頁65-66。
- ㉜ 引自黃興濤：〈民族自覺與符號認同：「中華民族」觀念萌生與確立的歷史考察〉，載郭雙林、王續添編：《中國近代史讀本》，下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頁700。該文原載香港《中國社會科學評論》，2002年2月創刊號。
- ㉝ 張旭光：《中華民族發展史綱》(桂林：文化供應社，1942)，頁1。
- ㉞ 引自王一影：〈泛論邊疆夷族青年的教育與訓練〉，《邊政公論》，第1卷第3、4期合刊，1941年11月10日，頁100。
- ㉟ 喜饒嘉錯：〈前赴青海視察寺院宣傳抗戰工作計劃概要〉，載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二編，〈文化〉(二)(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頁790。
- ㊱ 教育部西南邊疆教育考察團關於改進西南各省邊疆教育總建議書，載《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二編，〈教育〉(二)，頁156；166、167。
- ㊲ 〈發刊詞〉，《邊政公論》創刊號，1941年8月10日，頁3。
- ㊳ 周昆田：〈三民主義之邊政建設〉，《邊政公論》創刊號，1941年8月10日，頁8。
- ㊴ 〈抄發委員長蔣關於民族及邊疆問題代電〉，《江西省政府公報》，第1293期，1943年11月16日，頁28。
- ㊵ 島田美和：〈抗戰時期晉系地方實力派對蒙古族的研究及其宣傳工作：以蒙漢同源說為中心〉，載涂文學、鄧正兵主編：《抗戰時期的中國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頁616。